

论 汉 武 帝 刘 彻

凯 文

汉武帝刘彻是继秦始皇之后又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章太炎有篇名文《秦政记》，对秦始皇作了大体正确的评价，而对汉武帝的评价却存在着片面性。虽然他如实地指出了汉武帝的不少弱点和问题，但却说：“秦皇之与汉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至于其他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林彪之流，在评价汉武帝时，总是把他和屁儒董仲舒拉在一起加以吹捧，则是别有用心。这是由他们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而我们一些同志，在对汉武帝这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也存在一些模糊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究竟如何评价汉武帝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评价汉武帝时，把他放在当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既要肯定他的历史贡献，又要指出他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从而汲取历史斗争的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斗争服务。

一

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六十余年，虽然对诸侯王国分裂割据势力和奴隶主残余复辟势力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割据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奴隶主残余势力，特别是强宗豪右凭借着氏族血缘的传统力量，兼并土地，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是坚持打击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还是保护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削弱甚至颠覆中央集权制度，这是汉武帝面临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汉武帝，作为杰出的法家政治家，他坚持了法家路线，继汉景帝刘启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打击和削弱诸侯王的政策，并且注意到了打击作为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

首先，汉武帝接受主父偃“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通鉴·汉纪十）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令诸侯除以嫡长子承继王位以外，并推恩将分封地分给子弟，从而不断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此后不久，汉武帝又颁布“左官律”和“依附阿党之法”，压制诸侯王国官吏的地位，禁止他们网罗人材，结党营私，进一步限制他们政治势力的发展。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又借口诸侯王贡献祭祀的黄金分量不成色不

足，剥夺其爵位和削减其封地。一次夺爵达一百零六人。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恢复了秦始皇的监御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专门监察检查诸侯王和官吏的不法活动。

汉武帝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相应的加强。但是，如果不进一步彻底打击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强宗豪右，中央集权制度仍然是不可能巩固的。事实上，汉初数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豪门贵族、强宗豪右通过不断兼并土地，扩大了经济力量，又凭借卖爵免役，纳货为官的门路，攫取了政治特权。他们骄纵自恣，武断乡曲，甚至与诸侯王勾结，参与叛乱。汉武帝看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便采取果断措施，对河南的豪强穰氏予以灭族，对南阳的豪族宁氏、孔氏、暴氏——加以严厉惩治。公元前一二七年、前九六年，又先后把各地的“豪猾之民”、“并兼之家”和财产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迁到茂陵，使这些“强宗大姓，不能族居”。（后汉书·郑弘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对强宗豪右进行坚决打击之后，诸侯王国进行复辟叛乱的社会基础削弱了，中央集权制度才逐步得到巩固。

在打击强宗豪右的同时，汉武帝还坚决和诸侯王中隐蔽的复辟阴谋和公开的反革命军事叛乱活动进行了斗争。他不仅抵制和戳穿了中山王刘胜、河间献王刘德的复辟阴谋，并且坚决镇压了淮南王刘安未遂的反革命军事叛乱。

公元前一二八年，中山王刘胜乘入朝之机，在汉武帝面前大哭大闹，恶毒攻击晁错“削藩”之策使“宗室摈却，骨肉冰释”，（通鉴·纪九）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过不多久，“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刘德又来献旧书，献雅乐，妄图通过诗、书、礼、乐来宣扬孔孟之道的意识形态，以达到其“克己复礼”、复辟旧制度的反动目的。对此，汉武帝是有所警惕的。他并没有因为刘胜的大哭大闹改变既定的“削藩”政策，也不因为刘德献雅乐而放弃自己强化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对于妄图复辟的刘德，汉武帝连讽带刺地说：“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汉书·景十三王传，集解引《汉名臣奏》）意思说，商汤以七十里得天下，周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你可要努力呵！刘德发现汉武帝揭穿了他的阴谋，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逃了回去，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

事过不久，发生了淮南王刘安的叛乱。淮南王刘安是文帝时发动叛乱、勾结匈奴的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他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复辟狂。他本来参与了吴楚七国的叛乱，吴王刘濞早就派人和他勾结，他也决定出兵响应，只是由于带兵的淮南相不听他指挥，他的阴谋才未得逞。叛乱平定以后，刘安大耍反革命两面派，隐瞒参加叛乱的真象，骗取汉武帝对他的信任。暗地里他却和衡山王刘赐结成死党，妄图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他野心勃勃，急于要当皇帝，甚至凶相毕露地说：“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而臣事竖子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安，这个反革命复辟狂，为了颠覆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制度，首先也是大抓反革命舆论。他网罗了一批“诸儒方士”当他的“宾客”，“讲论道德，总统仁义”，抛出了一部旨在为复辟旧制度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淮南鸿烈集》。在这本黑书中，刘安打着杂家的招牌，大量散布儒家那一套复辟、倒退的货色；他恶毒攻击汉武帝“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原道训），叫嚷“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求立训）；并系统地提出了“存危国，继绝世”（傲真训）的反革命纲领。什

么“存危国，继绝世”，就是要保护和维持摇摇欲坠的地方割据的诸侯独立王国，就是要把丧失了世袭爵位或封地的世家豪族、强宗豪右重新扶植起来，一句话，就是要颠覆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制度。

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刘安还大搞阴谋诡计。一方面与隐藏在汉武帝身旁的儒家路线的代表武安侯田蚡早就暗中进行勾结，另一方面又派出自己的女儿刘陵潜入京城，凭着她的能言善辩和带去的大批钱财，出入宫闱，结识朝臣，从中刺探情报，同时指使太子刘迁积极筹备，阴谋杀害汉武帝派来的使者和大臣，从而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发动叛乱，汉武帝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他的宫庭，刘安这个反革命复辟狂最后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对于淮南王刘安的叛乱活动，汉武帝采取的措施是坚决的。“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通鉴·汉纪十一）经过这场斗争，终于结束了西汉王朝建立以来诸侯王一而再、再而三发动叛乱的局面，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巩固起来了。应该说，这是汉武帝执行法家路线的重大胜利。

二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矛盾是西汉王朝和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

匈奴是西汉北方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比西汉王朝整整落后一个历史时代。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度决定了他们要经常发动掠夺战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从秦到汉武帝近一百年来，匈奴奴隶主经常向中原地区发动掠夺战争，并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他们先后霸占了东胡、月氏、丁零、楼烦等二十多个小邦的土地，“虏其民畜产”，（汉书·匈奴传）对于匈奴民族内部的奴隶阶级，奴隶主贵族也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好奴杀伐，国人多不安”。（史记·匈奴列传）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先进农业国，匈奴奴隶主贵族更是垂涎三尺，经常发动突然袭击，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给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西汉王朝和匈奴的这个矛盾实质上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的矛盾。

面对这些矛盾，是勇驱强暴、敢于斗争，坚持抗击匈奴，还是畏敌如虎、不敢斗争，主张屈膝投降，这也是汉武帝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问题。法家是坚持抗击匈奴的路线的，而儒家则主张屈膝投降。屁儒董仲舒之流就公开宣扬“抗战必亡”、“投降保险”，“战备无用”的反动谬论。在屁儒鼓噪、投降声浪甚嚣尘上之时，汉武帝作为杰出的法家政治家，亲自主持召开御前会议，统一思想，坚持抗战。

汉武帝对大臣们说：匈奴“侵盗无已，边境数惊”，“今欲举兵攻之，何如？”主战派王恢立即表示拥护。他说：现在“海内为一，天下同任”，（汉书·韩安国传）边防又有准备，应该进行自卫反击。然而被匈奴的侵扰吓破了胆的韩安国却跳出来反对。他说：“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厉害呀，打不得。他还搬出“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汉书·韩安国传）的儒家经典，胡说什么三王五帝对夷狄都不讲打的呀，我们也不要打。并颠倒黑白，

捏造历史，说什么自娄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通鉴·汉纪十）王恢坚决驳斥了韩安国这种投降主义的论调，严正指出：“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汉书·韩安国传）大搞“法先王”是错误的。他还以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大破匈奴的事实说明对匈奴掠夺者“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同上）不仅如此，他还针对投降派大叫“抗战必亡”的悲观论调，指出“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同上）拿出百分之一的力量来抗击匈奴，犹“强弩射且溃之痛也！”（同上）汉武帝坚决支持王恢的建议，废除和亲，坚持抗战。

然而斗争并未止息。正当匈奴被打得大败，一方面要求复结“和亲”，一方面又进行侵扰的时候，反动儒生们又跳出来反对汉武帝的抗战路线。有个叫狄山的博士，公开叫嚷“兵者凶器也，不可久动。”（史记·酷吏列传）并胡说什么由于抗击匈奴引起了“内虚”和“边大贫困”，不如投降为好。法家张汤批判他是“愚儒无知”，他却反咬一口，大骂张汤是“诈忠”。汉武帝对此极为愤怒，当即令他去守一个边寨，这个“口能言治乱，无能以行之”（盐铁论·能言）的屁儒，不到一个月就被匈奴斩首而去。经过这样多次反复的斗争，汉武帝的法家抗战路线最后战胜了儒家的屈膝投降路线。

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武帝采取任人唯贤和赏罚严明的法家政策，把许多爱国将领和法家代表人物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大将军卫青，出身奴隶，汉武帝对他破格提拔，让他统帅千军万马，七次出击匈奴，歼敌五万余人，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郡；十八岁的青年将领霍去病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荀悦·《汉纪》）的豪言壮语，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六次出击匈奴，歼敌十一万人，在西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骠骑将军、冠军侯。汉武帝坚持这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显学）不论资排辈，重视新生力量的主张，实质上也是为了从组织上肃清儒家屈膝投降路线的影响，保证法家抗战路线的坚决执行。

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武帝还坚持民族政策，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团结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作出贡献。匈奴属部浑邪王在和西汉王朝的战争中连战连败，受到匈奴伊稚斜单于的斥责，并要将他诛戮，逼得他走投无路，便率众起义。汉武帝从建立一个多民族团结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对浑邪王的起义表示由衷的高兴，当即令长安令发车二千辆，前往欢迎。至浑邪王入都觐见，汉武帝立即封他为漯阴侯，裨王呼毒尾等四人，也都封为列侯。又将浑邪王旧地，改置武威、酒泉二郡。还有一个休屠王的太子日磾，本来当了战俘，在黄门处养马。汉武帝对他也加以团结，赐他姓金，封官侍中，“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汉书·金日磾传）汉武帝听到后，说：你们不懂得我的用心。从此，他对金日磾更是信之爱之。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注意到把匈奴族人民和被迫打仗的士兵同匈奴奴隶主贵族区别开，对起义与被俘的匈奴族官兵一一作了安置，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立四郡，在长城之外修筑防御工事，并将汉族人民和匈奴族人民迁居在一起，兴修水利，大规模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长城内外呈现出一派“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的民族大团结的繁荣兴旺的景象。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和各族人民结成反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同盟。后来又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地区设置了使者都尉和屯田都尉，并派人到南方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等九郡。

所有这一切，对于我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于我国和西方各国的联系的加强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在经济战线上也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

西汉前期，诸侯王和工商业奴隶主互相勾结利用，政治上串通一气，大搞分裂割据活动，反对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他们“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五千余人”、“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盐铁论·复古）。事实正是这样，吴楚七国之乱和淮南、衡山王的叛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依赖着这批工商业奴隶主的支持，从而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而汉武帝采取的法家经济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打掉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

首先，改革币制。西汉初期，听任郡国、地方自由铸钱，货币既不统一，铜钱大小、轻重又不一致，币制混乱现象特别严重。到汉武帝时，铸钱越来越多。当时，又正是西汉王朝财政经济困难时期，而那些工商业奴隶主只顾囤积居奇，冶铸煮盐，大发横财，而“不佐国家之急。”（汉书·食货志）于是，汉武帝进行了币制改革，一方面，统一货币，令诸郡国销毁旧钱，把铜运送中央，另铸五铢钱，流通全国。同时，汉武帝还推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公元前119年，宣布盐铁官营，把煮盐冶铁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并“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通鉴·汉纪十一）过了三年，又设立平准和均输官，调剂运输，平抑物价，“贵既卖之，贱则买之”，使中央“尽笼天下货物。”（汉书·平准书）不久，汉武帝又发布“算缗令”，要工商业奴隶主和高利贷者自报财产，以便向他们征收税收。但是，那些工商业奴隶主大多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有的甚至将财产转入地下。对此，汉武帝就颁布“告缗令”，对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者进行惩罚，奖励告发，财产一半没收，一半奖给告发人。采取以上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大多数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奴隶主和高利贷者从此破产，这对进一步荡涤奴隶主残余势力起了重大作用。

汉武帝推行这一系列法家经济政策，和推行法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一样，遭到了孔孟之徒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疯狂反对。大农令、博士颜异，代表地方割据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币制改革。胡说什么汉武帝改用皮币不应该，“本末不相称”。（汉书·食货志）还有一个博士徐偃，本来是奉诏去查访“兼并之徒”的，但他阳奉阴违，一到胶东，便鼓动胶东、鲁国的工商业奴隶主私自煮盐、冶铁，公开破坏盐铁官营政策。还有一个义纵，反对“告缗令”，令部吏逮捕为扬可执行告缗令的使者。对这些不法行为，汉武帝及时严厉惩处，徐偃和义纵都给处以极刑。御史大夫卜式恶毒攻击盐铁官营，又同大司农孔仅一起反对浪商船税，也一同被罢官。而卜式仍心怀不满，乘天旱之机，恶毒攻击代替孔仅职务的桑弘羊，胡说什么“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汉书·食货志）对于卜式的这种恶毒攻击，汉武帝不仅痛加驳斥，而且进一步提升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表示了他坚定不移地推行法家路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也是汉武帝执行的法家经济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公元前八八年，汉武帝下诏说：“方今之处，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并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决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赵过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根据农民长期积累的经验，发明了代田法和耧犁、耰车等新田器，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大搞

水利建设，如修陕西漕渠，长达三百余里，渠开后，节省漕运时间一半，灌溉民田一万多亩。西北各郡和长江以南都纷纷开渠灌田，形成了一个搞水利建设的热潮。公元前一一九年，黄河瓠子口决口，汉武帝选派汲仁、郭昌带领一万多民工前往塞口，并亲临现场视察，作瓠子口歌以鼓舞士气。当时，“将军以下皆负薪真决河”，可见工程之大，动员之广。由于上下一心，很快堵住了决口，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水害问题。

四

综上所述，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或者在经济上，汉武帝都坚持了法家路线，对进一步巩固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促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他的确不愧是继秦始皇之后又一个富有进取精神、有作为、有建树的杰出的法家政治家。而汉武帝之所以能够继承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则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是他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当时封建地主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割据势力、奴隶主残余势力，特别是和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还存在尖锐矛盾，这些矛盾就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推行法家路线，否则，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不能巩固，甚至会在地方割据势力、匈奴奴隶主贵族联合起来的反动进攻中被颠覆掉。当然，汉武帝个人的经历和学习也是他之所以坚持法家路线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汉武帝，虽然坚持了法家路线，但他毕竟还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他不可避免地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汉武帝虽然重用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如桑弘羊、汲黯、张汤等人，但也用了卫绾、赵绾、王臧、窦婴、田蚡这批孔孟之徒。他们擅权后，疯狂反对汉武帝的法家路线，卫绾就公开提出要把宣传申、韩法家政治思想路线的人从政府各部门赶出去，田蚡更是扬言要罢黜“刑名百家之言”，并大力网罗儒者，安插到政府各个部门。

特别是在汉武帝的纵容和迁就之下，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儒家势力已经开始抬头，如设明堂五经博士弟子员，儒家思想自由泛滥，儒书出笼，儒林兴起，出现了一个所谓“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史记·儒林列传）的局面。当时汉武帝的策问，就要求“见以春秋对”，公孙弘以善治春秋待诏金马门，为丞相封侯；董仲舒以反动神学对策，竟被擢为第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特别是为什么在执行法家路线的同时，竟然容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呢？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的某些征兆，反映了汉武帝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动向。

应当看到，经过秦王朝一系列社会变革，镇压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又经过西汉前期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和淮南、衡山王的叛乱，奴隶主残余复辟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大大削弱，封建制度基本稳定，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而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豪强兼并，赋役大增，地主阶级日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兴起，公元前九九年，徐敖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山东一带爆发，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官吏，声势相

当浩大。在农民武装起义的打击下，地主阶级逐渐由进步转向保守、反动。这时，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已不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怎样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和地主阶级专政，因而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不再适应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政治需要，相反的，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本来就与地主阶级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的儒家思想，具有保守、反动和富于欺骗性等特点，正好符合地主阶级当权派日趋保守、反动的阶级要求，稍加改造，就可以利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适应这种需要，就有一伙儒生跳出来向新主子兜售稍加改造的孔孟之道。而汉武帝，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要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统治地位，镇压农民的反抗，对农民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和箝制，所以，在他执行法家路线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容纳了孔孟之道，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正是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新“法度”所表现出来的新动向，正是地主阶级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的反映。到汉宣帝，这种变化就更突出了，他就公开宣布要“以霸王道杂之”。什么叫“杂”，就是说一手用“法治”继续巩固中央集权，一手用“礼治”来欺骗麻痹人民。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从汉武帝开始，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正处于矛盾状态和转化过程中，正处于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中，到汉元帝时更是发生了突变，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由真老虎变成纸老虎了。至于汉武帝个人后期，纵容儒生，迷信方士，以至酿成宫庭内部的巫蛊之祸，造成太子、公子、大臣大批被害，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孔孟之徒霍光之流来辅幼主昭帝，导致法家桑弘羊在盐铁会议后，惨遭杀害，则更是表现了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法家汉武帝的严重阶级局限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对汉武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汉武帝尽管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都比较正确，但由于思想文化路线不正确，容纳了孔孟之道，儒家得以从思想文化打开缺口后，到昭帝就逐步改变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路线的性质，到汉元帝时儒家路线就完全取得统治地位了。这就说明，即使是保守、反动的势力，要想改变一种政治路线，也是首先从思想路线开刀的。汉武帝，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顺应历史潮流时能执行法家路线，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抵制孔孟之道的腐蚀和侵袭，相反，他纵容儒生，迷信方士，这完全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不过，从汉武帝时儒家思想自由泛滥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就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光有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坚持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只有这样，反修才能彻底，防修才有保证！

我们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一定要发扬敢想敢干，知难而进，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积极参加斗争，并在斗争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